

特别是台湾诗人余光中、洛夫、张默、文晓村、李魁贤、李瑞腾等作家的书信，不仅数量多，并且极为重要

## 作家书信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

□邹建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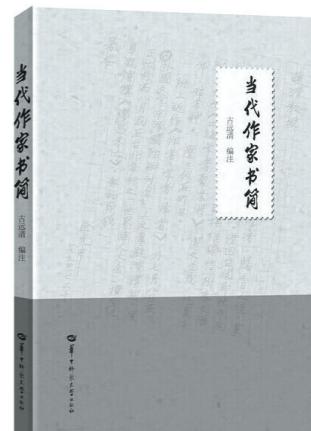
当代文学史料建设，对于文学史编撰和作家作品研究而言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然而，由于时间较近，往往为当代的人们所忽略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，都被丢弃了，甚至被毁灭了。如今天再来找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料，除报刊杂志之外，就相当困难了。因此，古远清教授用心费力编注的《当代作家书简》，就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。

作家和学者之间的来往书信，是研究作家和作品的重要佐证，外人不会轻易得到。而这些书信的拥有者古远清教授，不将其据为私有，而是结集出版，为当代文学和学术研究提供新资料，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

编者从2000多封书信中，选取近700封有一定价值的，集为一书，进行必要的注解，有作者的选择和见解在内，字里行间都是学问。书的代后记《尺牍满纸云烟，书简字字见情》是一篇有声有色、文情并茂的好文章，编者的精气神贯穿始终，并有许多精到的见识。和一般的交代文字不同，其情趣性、尖锐性、生命性、学术性和科学性，于此和盘托出，光彩照人。

由于书信的作者几乎都是名家，自改革开放以前以至于新世纪，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，其中所隐含的社会、历史和时代，特别是作家、学者个人的思想、感情和见识，往往是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，因而具有相当大的学术意义。

私人信件，由于不是在公众场所发表的，就更加真实可信，是我们研究作家作品和文学史时，必须要参考的不可多得的东西。因此，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是外在的，而学术价值则



是内在的。特别是台湾诗人余光中、洛夫、张默、文晓村、李魁贤、李瑞腾等作家的书信，不仅数量多，并且极为重要，是研究台湾文学的宝贵史料。

如果说这部书的编辑和编排，还有什么不足之处，我愿意提出以下几点，以供修订时参考：第一，全书按大陆、台湾、港澳和海外几个版块来编，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可以顺序倒过来，先海外、港澳、台湾和大陆，形成一种反向的结构，落脚点在自我。第二，在几个版块之下，如按姓氏笔画来排，更加精确。现按年纪大小，有的弄不清谁大，就会有些漏洞。第三，每人之书信，在排版时应当分开，不可全部接排，密密麻麻，不清不朗。第四，有的附录编者自己的信，绝大部分又没有附录，不太统一，也显得匆忙和随意。第五，有少量的书信并无实质性内容，可以删掉。第六，有的有删节，有的录全文，不知哪些有删节，哪些是全文。建议以后出书信稿集，再加以补充和完善。

**作家回望童年，通过一帧帧照片将往事加以锁定，它们是盎然的，诗意的，也包含着残酷的真实**

## 经时光折叠绽开情感之花

□刘军

### 历史与文学相切之处

马尔克斯曾经指出，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。为了追求真实，历史与文学虽然取向不同，但也有相互交叉或者说相切之处。比如说，对记录的重视就构成了同心之言的内容。《尚书》作为中国最早的文献集成，既是一本历史著作，也开创了记录体散文的范式。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《红与黑》，其副标题为“1830年纪事”，所谓纪事，乃记录的别称，也表达了作家借助小说呈现历史真实的欲求。

记录有时间线，包括时间的纵轴和横轴，记录同时指向具体的事件。时间轴和事件之间水乳交融，如此方构成了意义的原点。至于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去记录，历史与文学有明显的分野，历史推崇“在场”式的记录，第一手的、原始的文献资料，足以构成独立的声部。孔飞力的《叫魂》之所以让人称道，就在于作者使用了大量的乾隆皇帝的朱批手书。文学表达源于想象、虚构、缀合的技术特征，因此大多采用“杂取”“打捞”的记事手段。

散文这一文体虽然对生活真实、历史真实有着高度的依赖性，但是这一文体的记忆性写作特征尤其突出，而个体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片断里往往镌刻着情感投射，情绪记忆经过时光的折叠逐渐会绽开情感之花。也因此，散文里面的事实在与情感判断呈现出一种融合的姿态，对于同样一件事，自然会千人千态。

《日光底下》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关注，是因为它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叙事模式，将历史与文学、现实与想象、主观与客观、个体与集体、微观与宏观、过去与未来、物质与精神、自然与社会、人性与神性等众多元素融为一体，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文本。

《日光底下》共收录了十七篇散文，取材上比较多元，器物、人物、植物、饮食、建筑、嬉戏等要素构筑了一个相对静止却又活力非凡的场景单元。

《日光底下》承袭了南方临海的乡镇生活的倒影，底色是特定历史时期赋予人们的生活方式、思维观念、交往体系、家庭秩序。

《日光底下》是一本回忆录，也是散文集，它既是一本记录之书，也是一本回忆之书。

《日光底下》的作者是当代作家，他用细腻的笔触，记录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点点滴滴，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，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。

《日光底下》的作者通过回忆童年时代的经历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，揭示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，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。

《日光底下》的作者通过回忆童年时代的经历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，揭示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，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。